

文化再生产还是文化流动？*

——中国大学生的教育成就获得不平等研究

朱 斌

提要:本文利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详细考察了家庭阶层背景对大学生教育成就获得的影响。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精英阶层子女更可能成为学生干部,英语能力也更高,但学业成绩更差。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投入足够时间与精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文化资本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只有在考核与评价体系主观化、非标准化的情况下有效。此外,文化资本在其他资源的配合下能够发挥更大作用,故而精英阶层子女更受益于文化资本,这一结果与文化再生产理论相吻合。

关键词:文化再生产 文化抵制 文化流动 教育成就 教育不平等

一、研究问题

在现代社会,教育逐渐成为影响人们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重要乃至决定性因素,因此教育机会不平等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议题。国内社会学界已经积累了大量相关的经验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关系。现代化理论认为,教育扩张会为那些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从而降低教育机会不平等(Boudon,1974)。但以“MMI假设”(Maximum Maintained Inequality,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和“EMI假设”(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为代表的反对者则强调,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不平等之中的,而与教育扩张没有关系,因此,只要社会结构不平等未发生改变,教育机会不平等就不会随着教育扩张而下降

* 本文根据作者博士论文中的一章修改而成,感谢导师李路路教授长期以来的悉心指导,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当代中国教育分层研究”(17XNF028)的成果。

(Raftery & Hout, 1993; Lucas, 2001; Breen & Jonsson, 2005; Pfeffer, 2008; Breen et al., 2009)。

我国的经验研究基本支持了 MMI 假设和 EMI 假设,他们发现,教育机会不平等——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没有随着教育的扩张而得到有效遏制(刘精明, 2006; 李煜, 2006; 郝大海, 2007; 吴晓刚, 2009, 2016; 李春玲, 2010, 2014; 吴愈晓, 2013; 唐俊超, 2015; 叶晓阳、丁延庆, 2015)。但是,一个矛盾的现象是,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结构不平等迅速扩大,而上述研究并未发现我国教育机会不平等在此过程中有明显扩大,至少基于家庭阶层背景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维持了相对稳定。如果教育机会不平等嵌入在社会结构不平等之中而与教育扩张无关,那么在理论上需要回答的问题则是:基于家庭阶层背景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为什么会保持稳定,而没有随着社会结构不平等的扩大而上升?

另一方面,在高校持续扩招背景下,高校毕业生数量逐年攀升,大学文凭日益贬值,故而越来越多的本科生选择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以提高自己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优势。随着读研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学生应该会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来帮助自己获得读研机会,那么家庭阶层背景应该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最近的一项研究却显示,家庭阶层背景对于大学生在国内读研并没有显著影响(李忠路, 2016)。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似乎需要换一种思维,不仅需要探讨什么因素在扩大教育机会不平等,同时也要关注什么因素在抑制教育机会不平等。一方面,这可以从宏观层面如各种教育政策、社会制度去考虑;另一方面,则需要从微观层面探索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如何在学校中形成的,也即家庭阶层背景是如何影响子女的在校教育成就的。对于后者,现有研究显示,家庭阶层背景主要通过两种机制影响子女在校教育成就:资源转化机制和文化再生产机制(李煜, 2006)。资源转化机制是指家庭将其社会经济资源转化为子女教育成就的优势。但受布迪厄的影响,文化再生产机制获得了更多关注。该理论认为文化资本是连接社会结构不平等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中介变量,精英阶层子女由于从家庭中继承了更多文化资本,故而能够获得更高教育成就(布尔迪约、帕斯隆, 2002b; 布尔迪约, 2004)。然而,文化再生产理论也受到了其他理论的挑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文化抵制理论和文化流动理论。

文化抵制理论认为,文化再生产理论过于强调社会结构的决定性,

而忽视了学生及其家庭的能动性与文化创造性,事实上,学生尤其是工人阶层子女会反抗学校的教学范式和权威(Giroux, 1983; 威利斯, 2013)。文化流动理论则认为,文化资本的习得是一个长期过程,虽然孩童时期的家庭环境对文化资本的习得有影响,但并非是决定性的,之后的社会化过程,尤其是学校社会化的重要性不可低估,非精英阶层子女能够在学校中习得文化资本,而且文化资本的作用对于他们更有效(DiMaggio, 1982; Aschaffenburg & Maas, 1997)。

尽管文化抵制理论和文化流动理论丰富了关于教育机会不平等形成的理解,但也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文化抵制理论所强调的工人阶层子女的能动性主要是指消极能动性,体现为对教学范式与教学权威的反抗,而他们的积极能动性却常常被忽视。其次,虽然文化流动理论反对将文化资本作为阶层再生产的中介,但也认同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假设,即文化资本对教育成就的获得有着积极作用。其实,该假设本身就值得商榷,因为文化资本的作用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普遍适用的。

综上所述,对于理解教育成就的阶层差异而言,上述三种文化理论还不完善。在本文看来,教育成就不平等的形成并不像文化再生产理论所指出的那样简单直接,文化资本的作用存在一定条件,而这给了那些出身社会下层的学生发挥积极能动性的空间,从而能够使其突破社会结构壁垒、实现向上流动。这或许是我国教育机会不平等保持相对稳定的一个内在微观机制。

对于上述理论,本文将通过分析大学生教育成就的阶层差异来给予检验。国内许多研究表明,大学生在校获得的教育成就会影响到他们未来的升学与就业结果(张顺、程诚, 2009; 李宏彬等, 2012; 赖德胜等, 2012; 岳昌君、张恺, 2014; 李忠路, 2016)。但是,对于大学生是如何获得这些教育成就的,国内相关的经验研究并不多,仅有少量研究注意到大学生在校学生活动的阶层差异(李锋亮等, 2006; 朱新卓等, 2013),而这些研究通常是对文化再生产理论的直接应用,忽视了学生的能动性以及文化资本作用的复杂性。

下文将首先比较分析上述三种文化理论,在此基础上推导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然后说明本文使用的数据与方法,最后对统计分析结果给予解释。

二、理论比较:文化再生产、文化抵制与文化流动

文化再生产理论由布迪厄提出,用以解释社会再生产,其基本逻辑是:精英阶层子女从家庭中继承了更多的文化资本,而这些文化资本有助于他们在学校中获得更高的教育成就(布尔迪约、帕斯隆,2002a,2002b;布尔迪约,2004)。首先,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是区别于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一种资本形式,包括三种形态:身体化文化资本、物质化文化资本和制度化文化资本(Bourdieu,1986),但他并没有精确界定文化资本的内涵。在后续学者看来,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实质上是指制度化的精英文化,包括言谈方式、仪态修养、行为习惯、人际交往等(Lamont & Lareau,1988);在经验研究中,通常会使用有关精英高雅文化的物品、知识与行为来衡量文化资本(Lareau & Weininger,2003; Jæger,2011)。

其次,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的习得场所主要是童年时期的家庭,父母通过言传身教将文化资本传递给子女,而精英阶层子女之所以能够继承更多文化资本,是因为:第一,精英阶层父母本身掌握了更多的文化资本,故而他们有能力教导子女习得这些文化资本;第二,习得和掌握文化资本,例如学习艺术、观看音乐会等需要其他社会经济资本的支持,而精英家庭在这方面也有优势;第三,传递文化资本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英阶层父母有更多闲暇时间来培养子女(Blaskó,2003; Jæger,2011)。

最后,文化资本之所以有助于获得更高教育成就,乃是因为:一方面,学校中的教育行动本质上是一种“符号暴力”行为,由作为精英阶层代理人的教师根据精英文化的标准对学生进行考核和评价;另一方面,这种文化被精英阶层所垄断,学校教育并不会将其明确教授给学生,因此只有那些出身精英家庭的学生能够从小受到熏陶并熟练掌握,并在教学、日常活动、师生交流过程中表现出来,从而使得老师给予他们更高的评价(布尔迪约、帕斯隆,2002a;Lareau,2015)。

布迪厄与其合作者的一系列著作表明,在法国,不同家庭阶层背景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比例有明显差异,而且在大学内,不同背景的大学生所学专业以及学习进度均有明显差异(布尔迪约、帕斯隆,2002b;布尔迪约,2004)。后继的诸多经验研究也发现,那些家庭文化资本优越的

大学生的学业成绩更好,也更可能参与各种学生文化活动(Dumais, 2002; Goldrick-Rab & Pfeffer, 2009; Jæger, 2011; Roksa & Potter, 2011)。

虽然文化再生产理论得到大量经验研究支持,但也有研究者对其提出质疑,其中较有影响的理论包括文化抵制理论和文化流动理论。文化抵制理论认为,文化再生产理论过于强调外在于学校的社会结构对学校内部再生产的决定性作用,这种解释通常忽视了学校中行为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的表现,从而具有一种“宿命论”色彩,因为人们似乎看不到改变社会不平等的可能性(Giroux, 1983)。

威利斯(P. Willis)的研究显示,一些工人阶层子女(他称之为“家伙们”)存在一种“反学校”文化,这种“反学校”文化主要体现为对教学范式与教学权威的抵抗(威利斯, 2013: 22)。威利斯认为,“教学范式”中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形式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而“家伙们”的反抗则是在工人阶层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创新性的文化反应(威利斯, 2013: 68, 133 - 13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工人阶层子女的文化抵制却有助于精英阶层的再生产,因为接受标准的教学范式预示着可以通过教育向上流动,而那些存有抵制行动的“家伙们”拒绝了这种可能,放弃了自己的选择权利,最终巩固了现有的阶层地位。

文化流动理论最早源于迪马乔(P. DiMaggio)的研究,他基于韦伯的身份群体理论指出,当社会封闭性较强、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缺少交往时,以精英文化为内核的文化资本主要在家庭中习得。但在现代社会,由于受到国内外市场发展、交通运输和传媒规模扩大、城市化推进、教育扩张等因素的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不再局限于小范围的身份群体之中,这意味着人们可以从扩大化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场所中习得文化资本,其中学校就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场所,那些出身社会下层的学生可以在受教育过程中逐渐习得文化资本,从而实现向上流动(DiMaggio, 1982; DiMaggio & Mohr, 1985)。

与此同时,文化流动理论与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另一分歧在于,谁的子女更受益于文化资本。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出身于精英阶层家庭的学生将更受益于文化资本,这是因为他们父母大多数接受过高等教育,掌握了大量关于大学内部运行与实践的知识和信息,他们从小耳濡目染,故而也能够更好地解码学校中的“游戏规则”,让文化资本发挥更大作用(Aschaffenburg & Maas, 1997; Lareau, 2015)。另一方面,文化资本的作用有时需要得到其他资本(如经济资本)的支持,例如学生在

社交活动中通过展示自己的文化修养来获得教师与其他人的认可,而这些社交活动通常都需要经济资本予以支持。

在文化流动理论看来,文化资本与社会经济资本之间存在一种替代效应。虽然精英阶层家庭在这些资本上都占据着优势,但文化资本的传递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社会经济资本的传递相对简单。因此,精英阶层父母可能更重视社会经济资本的作用,而不会在家里营造高雅文化的环境,结果是他们的子女既不知晓文化资本的运作,也不重视文化资本的作用(DiMaggio, 1982; DiMaggio & Mohr, 1985)。与之相反,对于社会下层子女而言,其家庭缺乏社会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可在学校中习得,而社会经济资本更难直接获得,因此他们将更加重视文化资本的作用,以借此缩小他们与精英阶层子女的差距(DiMaggio, 1982; Aschaffenburg & Maas, 1997; De Graaf et al., 2000)。

比较上述三种理论,文化抵制理论与文化流动理论的对话对象都是文化再生产理论,但二者侧重点不同。与文化再生产理论一样,文化抵制理论也认为学校最终成功实现了“再生产”,所不同的是,后者强调这是经过一番斗争才出现的结果,而不是直截了当的。与文化再生产理论和文化抵制理论都不同的是,文化流动理论认为教育也可以成为社会流动的渠道,因为工人阶层子女可以从学校中习得文化资本,而且文化资本的作用对于他们更有帮助。

文化抵制理论和文化流动理论丰富了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理解,不过二者也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首先,文化抵制理论虽然强调工人阶层子女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但在经验研究中,往往体现为“反学校”文化。有学者认为,这些“反学校”文化事实上仅仅局限在少数工人阶层子女身上,工人阶层的主流文化与“反学校”文化并不一致,大多数工人阶层父母同样非常尊重“读书人”,也希望通过教育使自己的子女向上流动(布莱克莱吉、亨特, 1989: 225 - 229)。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少数工人阶层子女的消极能动性,在学校正常的“教学范式”之下,大部分工人阶层子女的积极性更需要关注。

其次,正如上文所言,文化资本之所以有助于获得更高教育成就,一是因为教师是精英阶层代理人,会根据精英文化对学生进行考核和评价;二是因为这种精英文化主要是在家庭中获得,而学校并不会明确教授(布尔迪约、帕斯隆, 2002a; Lareau, 2015)。文化流动理论反对后一命题,并且强调文化资本(也即精英文化)同样能在学校中习得,故

而学校不是再生产工具。然而,文化流动理论与文化再生产理论共享前一个基本假设:教师根据精英文化对学生进行考核和评价,因此文化资本对于教育成就的获得有着积极影响。毫无疑问,教师在学生的考核和评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教师主观上可能也希望根据文化资本的掌握来评价学生,但教师能否真正实现却值得商榷,因为很多时候考核内容与评价标准不是教师所能决定的,而是客观化、标准化的。

当考核内容与评价标准不是客观化、标准化时,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来评价学生,此时那些有文化资本的学生通常被教师看重,评价也就更高。但是,若考核内容与评价标准是客观化和标准化的,教师评判时的自由裁量权就受到很大限制,而不得不按照客观标准来评价(胡安宁,2017)。这个时候,对考核内容与评价标准的掌握与熟悉程度则成为影响评价的更重要因素,而这又与学生自身的认知能力与努力程度相关(Katsillis & Rubinson, 1990; De Graaf et al., 2000; Sullivan, 2001)。有学者认为,相对于文化资本仅仅反映精英群体身份文化的特殊性、社会性,认知能力和努力程度则更接近于经济学所说的人力资本,具有一般性、工具性特点(Bourdieu, 1986; Farkas, 2003; Lareau & Weininger, 2003)。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文化资本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考核与评价体系的客观化和标准化程度,客观化和标准化程度越高,文化资本作用越弱,而学生的认知能力和自身努力程度则能发挥更重要作用。正因为此,出身社会下层的学生才拥有发挥能动性的空间,可以通过不断努力获得更高的教育成就,从而突破社会结构限制。正如许多研究所发现的,教育系统标准化程度越高的社会,越能抑制家庭阶层背景在教育过程中的影响,从而促进教育平等(Stevenson & Baker, 1991; Park, 2008; Horn, 2009; Van de Werfhorst et al., 2010; Xu & Hampden-Thompson, 2011; Byun et al., 2012; 卡拉贝尔, 2014),但很少有研究讨论这在学校内部是如何具体实现的,下面我们以中国大学内部的教育过程为例来检验上述理论。

三、研究假设

首先,文化抵制理论认为工人阶层子女在学校中总爱显示对教学

权威的反抗,具体表现为奇装异服、抽烟、酗酒、打架(威利斯,2013:22),反对者则认为这只是少部分人的行为。在我国,关于农民工子女的研究也有这样的矛盾现象,有学者发现农民工子女中也存在类似的“反学校”文化:“这里绝大部分孩子并不关心读书,也不孜孜以求学业的进步;相反,他们拒绝学校所传递和教导的知识,以上网、看小说、嬉笑打闹为乐”(周潇,2011)。但也有研究认为,流动儿童在遭遇社会结构限制时,并不是一味放弃学业,与之相反,他们会在此限制下更加努力或者选择更好的升学机会(熊春文、刘慧娟,2014)。上述研究都是个案研究,难以观察到学生的整体面貌。就本文探讨的大学生而言,笔者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教育理念,这种理念已经融入各个阶层,有研究发现中产阶层父母的教养理念与社会下层并没有本质差异(洪岩璧、赵延东,2014),故而没有理由认为出身工农阶层家庭的学生更可能出现“反学校”文化和行为。恰恰相反,考虑到他们的家庭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处于劣势地位,他们向上流动的意愿会更强烈,在学校中可能会更努力,由此作出假设1。

假设1:出身工农阶层家庭的大学生在学校中会表现得更努力。

其次,正如上文所说,考核和评价方式决定了教育成就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通常考察的教育成就包括学业成绩、学生干部以及英语四级成绩(李锋亮等,2006;赖德胜等,2012;朱新卓等,2013;李忠路,2016)。根据笔者在高校中学习与教学的经验,高校本科课程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公共课较多,如数学、政治以及通识课等,这些课程很多使用国家统一指定教材,并且通过客观的标准化试卷来考核。二是就专业课而言,一方面,很多专业课也采用标准化考试,人文社会科学虽然主观化程度较高,但是所出题型往往也是“名词解释”、“简答”、“论述”这样的题目,实际上都有标准答案;另一方面,还有少量课程会采用论文的方式进行考核,这种方式的主观化程度较高,但是,这种考核给出的分数差异往往并不大,而且由于这类课程不多,故而对整体成绩的影响有限。综合来看,笔者认为,目前高校课程的考核与评价方式的客观化与标准化程度还是比较高,考核内容会在课堂上明确传授给学生,考核方式主要是标准化考试。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是根据学生客观答题情况来评分的,其判定成绩的自由度受到限制,学生的学业成绩主要与其认知能力、平时努力程度相关,而与文化资本关系不大。

与学业成绩不同的是,学生干部的选拔标准较为模糊,虽然学生的

社会关系网,尤其是与老师的关系会影响到学生干部的选拔,但更重要的还是学生参与课外活动时的积极表现,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领导能力、组织能力、沟通能力等难以观察的素质。学校一般不会教授任何关于参与和组织学生活动的方法或者技巧,这就给文化资本留下了很大的作用空间。现有研究发现,精英阶层的子女更可能参与大学中的各类学生活动,而且更可能成为学生团体中的领导者或者说学生干部,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精英阶层的父母从小就注重对其子女性格、心理素质以及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从而使其子女与老师交流更顺畅,更加熟悉和适应大学中学生活动的形式与内容(Dumais, 2002; Stuber, 2009; Lehmann, 2012; 李峰亮等, 2006)。

至于英语四级成绩,一方面这是标准化考试成绩,学生通过努力能够适应这种考试;另一方面,语言恰恰是文化资本理论最为强调的元素。伯恩斯坦就指出,语言能力的培养是在日常生活中“默会地习得”,其中家庭是儿童语言能力最初发展的地方,尤为重要(王瑞贤, 2009: 272 - 276)。许多精英阶层父母自己也会说英语,能够在子女儿童时期就开始教授他们英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一般学业成绩,个人努力具有决定性作用,而文化资本则没有显著作用。如果工农阶层子女在校努力程度更高的话,那么他们的学业成绩应该不低于精英阶层子女,甚至会更高。相比之下,对于学生干部和英语能力,文化资本可能更有帮助,而精英阶层子女在这两个方面具有更大优势。故而可以得出假设2。

假设2:对于学业成绩而言,个人努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工农阶层子女的学业成绩高于精英阶层子女;对于学生干部和英语四级成绩,文化资本具有更重要的影响,精英阶层子女更有优势。

进一步而言,如果文化资本有助于大学生成为学生干部以及提高英语能力,那么它对于谁的子女更有帮助呢?总的来说,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精英阶层子女对学校中的“游戏规则”了解得更多,又掌握了更多的社会经济资本,因此运用文化资本的能力更强,获得文化资本回报的概率更高。而文化流动理论则强调工农阶层子女运用文化资本的意愿更强,精英阶层子女则更加重视投入回报迅速直接的社会经济资本。

相关的经验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迪马乔的研究率先提出文化流动模式,但他也发现只有男生适用于文化流动模式,文化资本对教育成就的积极影响仅限于那些来自底层或中等家庭的男生;而对于解释女生

的教育成就来说,文化再生产模式更适合(DiMaggio,1982)。此后的研究多有分歧,有的支持文化流动模式(De Graaf et al.,2000),有的发现文化资本的作用在各阶层之间没有差别(Blaskó,2003),还有研究指出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本其模式是不一样的(Jæger,2011;孙远太,2010)。

就中国大学生而言,考虑到学生活动表现与英语能力对大学生未来的升学与求职都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对出国留学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李忠路,2016),而在高等教育扩张背景下,出国留学是提升文凭含金量的重要方式(许家云等,2014),也是精英阶层实现阶层再生产的重要渠道。因此,笔者认为出身精英阶层的大学生既有能力也有意愿运用文化资本来获得更高的学生干部身份和更高的英语成绩,由此可以得到假设3。

假设3:相比于工农阶层子女,家庭文化资本对于精英阶层子女的作用更大。

四、研究方法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收集的“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Beijing College Students Panel Survey, BCSPS)。^①该调查利用北京市教委提供的2006级和2008级在校学生学籍数据库作为抽样框,采用分层、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抽样方法随机抽取了5100名大学生,从2009年开始实施调查,并在2010-2013年连续四年对同一组调查对象进行了四次追踪调查。这些调查收集的信息包括:被访大学生的基本情况、心理状况、学业成绩、社会活动、政治参与、经济来源、职业意向、毕业结果、观念行为等。^②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是大学生在校部分内容,包括两个部分:对于2006级,主要使用第一轮和第二轮的调查数据;对于2008级,则使用前面四轮调查的数据。删除各变量中有缺失的样本后,总共有4004个样本进入分析。

① 作者感谢冯仕政、王卫东和李丁等老师慷慨提供数据。

② 有关调查的详细信息,可以参考《中国大学生成长报告》(李路路,2014)。

(二) 变量

1. 因变量: 在校教育成就

本文所讨论的教育成就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学业成绩, 二是担任的学生干部, 三是英语四级成绩。

每一轮调查都询问了被访者的班级人数和“到目前为止”在班上的成绩排名, 本文将学生成绩排名平均分为五等, 排名前 20% 的赋值 5 分, 以此类推, 排名最后 20% 的赋值 1 分, 赋值越高, 说明被访者的学业成绩越好。本文以被访者大四快毕业时的学业成绩作为因变量, 这是因为大学学业成绩是逐年累积的, 因此大四学业成绩可以看作是大学四年的最终成绩。若被访者大四学业成绩缺失, 则以大三学业成绩替代, 这主要是考虑到大学中的课程集中在大四以前, 大四少量课程对学生总的学业成绩影响不大。

关于学生干部, 一些学者仅讨论是否成为学生干部, 这很难反映学生干部经历的丰富内涵。事实上, 中国大学中的学生干部体系复杂, 不同类型和层级的学生干部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很大差异, 而且不同干部经历对他们未来升学与就业的影响也不一样。例如, 据笔者所知, 校学生会干部在保研过程中的加分要远远高于班级干部。根据笔者在大学生中参与学生活动的经验以及与其他学生交流获得的信息, 大体上可以将学生干部分为五个层次, 由高到低依次赋值 5 到 1 分, 具体见表 1。一般而言, 大学中的学生干部也是逐级向上选拔的, 越往上人数越少, 因此这里以大学生得分最高的学生干部为最终因变量。

表 1 学生干部层次与赋值

赋值	层次
5	校级团委、学生会主要干部
4	院系级团委、学生会主要干部, 学校所属组织主要干部, 校级团委、学生会部门主职干部
3	校级团委、学生会部门副职干部, 院系级团委、学生会部门干部, 学校所属组织部门干部, 自组织社团主要干部
2	班级主要干部, 自组织社团部门干部
1	干事或从未担任

选择英语四级成绩主要是因为大学生普遍参加了英语四级考试, 一些大学甚至以通过英语四级考试作为毕业的必要条件, 而英语六级

考试不是所有大学生都会参与。而且不同于学校自己组织的英语考试,英语四级考试使用的是同一套试卷,故而该成绩可以进行直接比较。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学业成绩中也包含了英语成绩,但只占非常小的比例,难以用来比较大学生语言能力的高低。

2. 核心自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包括家庭阶层背景、家庭文化资本与在校努力程度。该数据分别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调查中询问了大学生父母职业,其中第一次调查询问的是父母从事最长时间的职业,第二次调查询问的是现职。本文以第二次调查中父母地位较高一方的职业阶层作为家庭阶层背景,其中有少量缺失,以第一次调查数据给予补充。家庭阶层背景可以分为四个阶层:管理者阶层,包括企事业管理人员、机关干部以及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阶层;工农阶层,包括农民、产业工人和无业人员;一般非体力阶层,即其他职业。

与家庭阶层背景相联系的是家庭文化资本。国内大多数经验研究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作为家庭文化资本的指标,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精英阶层的父母并不一定会营造更好的文化环境,因此为了更直接地测量家庭文化资本,本文使用家庭的文化资源作为家庭文化资本的指标。第一次调查询问了大学生家里是否有以下东西:“订阅或经常购买报纸”、“百科全书、辞海、辞典或其他参考书”、“超过50本书籍”、“古典或经典文学著作”、“诗歌集”、“艺术品(如画作)”,1表示有,0表示没有。笔者将上述六个项目的分值相加,得分越高,说明家庭文化资本越高。

大学生在校努力程度对于不同教育成就衡量指标有所不同。对于学业成绩和英语四级成绩,我们以大学生的逃课情况来衡量他们的学习努力程度。每次调查都会询问被访者上学期是否逃课,逃课的课程包括公共课和专业课,这里将“经常逃课”设为3分,“偶尔逃课”设为2分,“从来没有”设为1分,我们以历年调查的平均得分作为逃课情况,得分越高,逃课频率越高。对于学生干部,我们以被访者参与学生活动的时间来衡量其努力程度,调查询问了被访者本学期每周参与学生活动的平均时间,我们以历年调查的平均活动时间作为具体测量指标。

3. 控制变量

考虑到大学生的同质性较强,本文的控制变量不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大学生的性别、民族与入学前的户籍,这三个变量都是虚拟

变量,其中性别变量以女性为参照项,民族变量以少数民族为参照项,户籍变量以农业户口为参照项。

第二组控制变量是大学生所在学校类型、专业与年级。笔者将学校区分为三类:一类是由北大、人大、清华构成的精英大学,这三所高校是北京市最好的三所大学,抽样时也是单独列为抽样框的;二是除了北大、人大、清华以外的 211 大学;三是非 211 大学。专业变量则按照大学生所学专业所属大类分为三大类:人文科学类、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类。年级设置为虚拟变量,以 2006 级为参照项。

最后,资源转化机制也是家庭阶层背景影响子女教育成就的重要机制(李煜,2006),虽然不是本文讨论内容,但在模型中要对家庭经济资本予以控制。该变量使用第一次调查时(2009 年调查)的家庭年收入来表示,由于家庭年收入差异过大,本文将其取对数代入模型。表 2 给出了上述变量的简单描述统计。

表 2 相关变量的简单描述统计 N = 4004

变量		2006 级	2008 级	总体
教育成就	学业成绩	3.47(1.22)	3.48(1.21)	3.48(1.21)
	学生干部	2.01(1.02)	2.25(1.17)	2.12(1.10)
	英语四级成绩	506.50(72.10)	519.07(72.10)	512.56(72.37)
家庭阶层(%)	工农阶层	22.92	20.13	21.58
	一般非体力阶层	33.06	33.44	33.24
	专业技术阶层	10.42	12.01	11.19
	管理者阶层	33.59	34.42	33.99
家庭文化资本		3.82(2.04)	4.08(1.98)	3.95(2.02)
家庭经济资本		10.58(1.14)	10.61(1.11)	10.60(1.13)
逃课		1.99(0.48)	1.96(0.48)	1.97(0.48)
学生活动时间(小时)		4.67(6.55)	4.48(4.62)	4.58(5.70)
性别(1 = 男,%)		52.80	53.16	52.97
民族(1 = 汉,%)		89.29	89.18	89.24
入学前户籍(1 = 非农户口,%)		71.67	72.26	71.95
学校(%)	精英大学	27.32	30.28	28.75
	211 大学	35.52	35.66	35.59
	非 211 大学	37.16	34.06	35.66
专业(%)	人文科学	9.46	11.96	10.66
	社会科学	33.88	33.23	33.57
	自然科学	56.66	54.81	55.77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三)模型

本文将使用两种模型:序次 Logit 模型(Ologit)和一般线性回归模型(OLS),当因变量是序次变量,如学业成绩和学生干部时,则使用 Ologit 回归模型;当因变量是连续变量时,使用 OLS 回归模型。

五、结果分析

(一)家庭阶层背景与文化资本、个人努力

根据文化再生产理论和文化抵制理论,本文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出身不同家庭阶层的大学生在文化资本与个人努力上是否存在差异?首先,模型 1-1 的因变量是家庭文化资本,可以看到,与工农阶层家庭相比,其他三个阶层家庭中的文化资本都显著更高,尤其是精英阶层家庭,这一结果与文化再生产理论相吻合。其次,模型 1-2 考察大学生的逃课情况,数据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其他阶层子女的“逃课”得分显著高于工农阶层子女,说明他们更可能逃课。而且家庭经济资本对逃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文化资本的系数不显著,这意味着家庭经济条件越好的大学生越可能逃课。最后,模型 1-3 的结果发现,一般非体力阶层与管理者阶层子女参与学生活动的时间同样少于工农阶层子女,专业技术阶层的系数虽然为负但不显著,而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此也没有显著影响。综上所述,工农阶层子女虽然家庭文化资本含量最低,但他们在学校中最为努力,不仅在学习中更为努力,而且参与学生活动也更积极,这与假设 1 相符。

表 3 家庭阶层背景与文化资本、自身努力的关系

	家庭文化资本	逃课	学生活动时间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B/S. E.	B/S. E.	B/S. E.
性别(男=1)	-.250 *** (.052)	.165 *** (.016)	-.513 * (.203)
民族(汉=1)	.208 ** (.076)	.030 (.023)	-.638 * (.294)
户籍(非农户口=1)	.992 *** (.066)	.006 (.021)	-.387 (.260)

续表 3

	家庭文化资本	逃课	学生活动时间
	模型 1 - 1	模型 1 - 2	模型 1 - 3
	B/S. E.	B/S. E.	B/S. E.
学校(参照项:精英大学)			
211 大学	-.072 (.091)	-.006 (.028)	.249 (.351)
非 211 大学	-.161 + (.090)	-.022 (.028)	.403 (.350)
专业(参照项: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224 * (.088)	.078 ** (.027)	.217 (.339)
自然科学	-.285 *** (.085)	.016 (.026)	-.926 ** (.328)
年级(2008 级 = 1)	.226 *** (.048)	-.022 (.015)	-.340 + (.187)
家庭阶层(参照项:工农阶层)			
一般非体力阶层	.863 *** (.073)	.097 *** (.023)	-.701 * (.287)
专业技术阶层	1.521 *** (.107)	.153 *** (.033)	-.414 (.422)
管理者阶层	1.586 *** (.087)	.107 *** (.028)	-.957 ** (.350)
家庭经济资本	.447 *** (.026)	.049 *** (.008)	-.050 (.106)
家庭文化资本		-.003 (.005)	.039 (.061)
常数项	-2.339 *** (.289)	1.248 *** (.089)	7.065 *** (1.127)
N	4004	4004	4004
R ²	.442	.061	.020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二) 家庭阶层背景与教育成就获得

1. 学业成绩

首先来看学业成绩的获得。模型 2 - 1 是基础模型,加入了性别、民族、入学前户籍、学校、专业、年级和家庭阶层变量,结果发现:第一,男生的学业成绩显著低于女生;汉族学生的学业成绩显著高于少数民族学生;入学前户籍对于大学生的学业成绩没有明显影响。第二,学

校、专业、年级都没有显著影响,这是因为大学学业成绩都是各学校自己判定的,因此从各高校、各专业、各年级抽样出的样本应该没有显著差异。第三,在控制上述变量后,家庭阶层背景对学业成绩有显著影响,只不过与文化再生产理论的预测有所不同,出身工农阶层家庭的大学生的学业成绩最好,而其他阶层子女的学业成绩都比前者差。

其次,在后面的模型 2-2 中加入了大学生的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结果显示家庭经济资本对大学生的学业成绩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而家庭文化资本则没有显著影响。而且加入这两个变量后,家庭阶层变量的影响大大减弱了,说明家庭经济资本是家庭阶层背景影响的中间变量。

最后,模型 2-3 中加入“逃课”变量后发现,逃课得分越高,大学生学业成绩越低,而且在控制了“逃课”变量后,家庭阶层变量和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均不再显著。这说明工农阶层子女之所以在学业成绩上有突出表现,决定性原因在于他们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而那些家庭经济条件更好的精英阶层子女则更可能逃课,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他处。

2. 学生干部

模型 3 主要分析了大学生担任学生干部的情况。与上文类似,模型 3-1 仅加入了控制变量和家庭阶层变量:首先,男生担任学生干部的级别低于女生,从上面学业成绩的结果来看,男生的学业成绩也要弱于女生。可见在目前中国大学内,性别不平等已经得到较大改善,女生所获得教育成就甚至高于男生,那么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可能更多地来自于性别歧视而不是人力资本的差异。除此之外,民族和户籍变量均不显著。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同学校与年级的大学生在担任学生干部上也有差异,精英高校大学生的平均得分最高;与此同时,2008 级大学生的平均得分要高于 2006 级大学生。这种差异可能是因为不同学校 and 不同年级的机会结构不一样,也就是说,更好的学校可能有更多的社团组织,从而能使更多大学生担任学生干部;同样的,2008 级大学生可能也有更多机会。

家庭阶层背景对于大学生担任学生干部也具有显著积极影响,相比于出身工农阶层的大学生,精英阶层尤其是管理阶层的子女在成为学生干部上具有显著优势。为了揭示家庭阶层背景的具体影响机制,模

N=4004

表 4 关于大学生教育成就的回归分析

	学业成绩				学生干部				英语四级成绩			
	模型2-1	模型2-2	模型2-3	模型3-1	模型3-2	模型3-3	模型4-1	模型4-2	模型4-3			
	B/S.E.	B/S.E.	B/S.E.									
性别 (男=1)	-0.859*** (-0.063)	-0.859*** (-0.063)	-0.708*** (-0.064)	-0.145* (-0.063)	-0.141* (-0.063)	-0.116+ (-0.063)	-22.448*** (-2.172)	-22.256*** (-2.175)	-21.273*** (-2.202)			
民族 (汉=1)	.326*** (-0.089)	.333*** (-0.089)	.399*** (-0.090)	.053 (-0.092)	.039 (-0.092)	.064 (.093)	21.396*** (-3.158)	20.655*** (-3.157)	20.834*** (-3.155)			
户籍 (非农户口=1)	-0.096 (-0.075)	-0.058 (-0.079)	-0.051 (-0.079)	.042 (-0.077)	-0.028 (-0.081)	.008 (-0.082)	3.751 (-2.684)	.459 (-2.793)	.497 (-2.791)			
学校 (参照项: 精英大学)												
211大学	.154 (-0.109)	.141 (-0.109)	.135 (-0.110)	-0.450*** (-0.108)	-0.432*** (-0.109)	-0.456*** (-0.109)	-49.089*** (-3.766)	-48.169*** (-3.766)	-48.203*** (-3.763)			
非211大学	.053 (-0.108)	.051 (-0.108)	.025 (-0.109)	-0.518*** (-0.108)	-0.509*** (-0.108)	-0.554*** (-0.109)	-87.582*** (-3.756)	-87.153*** (-3.750)	-87.286*** (-3.747)			
专业 (参照项: 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0.157 (-0.104)	-0.156 (-0.104)	-0.079 (-0.104)	.205+ (-0.106)	.213* (-0.106)	.207+ (-0.107)	14.868*** (-3.642)	15.048*** (-3.638)	15.512*** (-3.639)			
自然科学	-0.076 (-0.101)	-0.083 (-0.101)	-0.094 (-0.102)	.174+ (-0.103)	.190+ (-0.103)	.256* (-0.104)	9.601** (-3.524)	10.318** (-3.522)	10.416** (-3.519)			
年级 (2008级=1)	-0.008 (-0.057)	-0.005 (-0.057)	-0.025 (-0.057)	.333*** (-0.058)	.324*** (-0.058)	.356*** (-0.059)	8.707*** (-2.006)	8.270*** (-2.007)	8.140*** (-2.006)			
家庭阶层 (参照项: 工农阶层)												
一般非体力阶层	-0.286*** (-0.082)	-0.232** (-0.087)	-0.111 (-0.088)	.029 (-0.085)	-0.053 (-0.089)	-0.026 (-0.090)	11.588*** (-2.930)	7.354* (-3.082)	7.934* (-3.086)			
专业技术阶层	-0.227+ (-0.121)	-0.137 (-0.130)	.070 (-0.132)	.225+ (-0.122)	.088 (-0.130)	.109 (-0.131)	20.022*** (-4.231)	12.918** (-4.527)	13.826** (-4.535)			

续表4

	学业成绩				学生干部				英语四级成绩			
	模型2-1	模型2-2	模型2-3	模型3-1	模型3-2	模型3-3	模型4-1	模型4-2	模型4-3			
	B/S.E.	B/S.E.	B/S.E.	B/S.E.	B/S.E.	B/S.E.	B/S.E.	B/S.E.	B/S.E.			
管理者阶层	-2.69** (-.093)	-.168 (-.106)	-.039 (-.107)	.419*** (-.096)	.269* (-.109)	.316** (-.110)	14.024*** (-3.309)	6.203+ (-3.760)	6.840+ (-3.764)			
家庭经济资本		-.057+ (-.033)	-.001 (-.033)		.050 (-.033)	.058+ (-.033)		2.991** (-1.134)	3.280** (-1.138)			
家庭文化资本		-.012 (-.019)	-.015 (-.019)		.039* (-.019)	.037+ (-.019)		1.747** (-.656)	1.728** (-.656)			
逃课			-1.275*** (-.065)						-5.953** (-2.147)			
学生活动时间												
截点/常数项						.064*** (-.005)						
截点1	-3.219*** (-.185)	-3.781*** (-.355)	-5.621*** (-.371)	-.345 (-.178)	.205 (-.351)	.661 (-.355)	524.428*** (-6.073)	492.873*** (-12.096)	500.301*** (-12.380)			
截点2	-1.761*** (-.176)	-2.323*** (-.351)	-4.087*** (-.365)	.790*** (-.178)	1.342*** (-.352)	1.832*** (-.356)						
截点3	-.522* (-.174)	-1.083** (-.349)	-2.759*** (-.362)	2.131*** (-.182)	2.685*** (-.354)	3.217*** (-.359)						
截点4	.710*** (-.175)	.151 (-.349)	-1.442*** (-.361)	3.990*** (-.208)	4.544*** (-.368)	5.102*** (-.373)						
N	4004	4004	4004	4004	4004	4004	4004	4004	4004			
-2Log Likelihood	11877.93	11873.65	11470.65	10670.51	10661.67	10498.17						
R ²							.185	.189	.191			

注: + p<0.1, * p<0.05, ** p<0.01, *** p<0.001。

型3-2中加入了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可以看到家庭文化资本有助于大学生成为学生干部,经济资本虽然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

最后来看学生活动时间与学生干部的关系。在模型3-3中加入学生活动时间后,可以发现该变量系数显著为正,也即参与学生活动越积极,越可能成为学生干部。那么,会不会越是学生干部参与学生活动越积极呢?如果是这样,精英阶层子女更可能成为学生干部的话,那么他们参与学生活动的应该时间更多,然而模型1-3的结果却不是这样的。在加入学生活动时间后,家庭文化资本依然保持显著作用,而且原本在模型3-2中系数变小的家庭阶层变量又重新变大,这正是因为精英阶层子女的学生活动时间要少于工农阶层子女。总的来看,虽然工农阶层子女更积极参与学生活动,但因为只掌握了少量的文化资本,依然难以在学生干部竞争中占据优势。

3. 英语四级成绩

接下来是大学生的英语四级成绩。首先,男生再一次弱于女生,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男生英语四级成绩比女生平均低了22分;与此同时,汉族学生与少数民族学生之间也有显著差异,前者的英语水平明显更高;而大学生入学前户籍依然没有影响。其二,精英大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专业以及2008级大学生的英语四级成绩相对更高,这是因为英语本身就是高考科目,那些能够进入重点大学的大学生通常英语能力也较强,而且中国大学中人文科学专业相对冷门,故而进入这些专业门槛更低,英语成绩也相对较低。其三,家庭阶层背景对于大学生的英语四级成绩同样具有显著积极影响,精英阶层尤其是专业技术阶层子女的英语四级成绩明显更高。第四,模型4-2加入了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结果发现二者对大学生英语四级成绩都有显著积极影响。虽然家庭阶层系数变化很明显,但依然显著,说明语言能力的培养与家庭环境确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可能还有其他未观察到的家庭因素存在影响。最后,在模型4-3中加入了“逃课”变量,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努力学习同样能提高英语四级成绩。与此同时,家庭阶层变量和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变得更强了,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变量与“逃课”存在一定反向关系。

综上所述,文化资本对不同教育成就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文化资本对于大学生的学业成绩没有影响,真正有影响的是大学生自身的努力程度。精英阶层子女用于学习的时间和精力更少,故而学业成绩

更低。与学业成绩相比,文化资本对于学生干部和英语成绩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尽管精英阶层子女在这两方面的努力程度也不如工农阶层子女,但他们依然能够凭借文化资本的优势而成为更高级别的学生干部,获得更高的英语成绩。上述结果支持了假设 2。

(三)文化资本作用的阶层差异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家庭文化资本对于学业成绩并没有影响,但对学生干部和英语四级成绩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的问题则是,谁的子女更受益于文化资本呢?笔者分别在模型 3-3 和模型 4-3 的基础上加入了文化资本与家庭阶层背景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就学生干部获得来说(模型 5-1),文化资本与家庭阶层背景的交互项系数均为正,但仅有管理者阶层与文化资本的交互项显著,这说明文化资本对于管理者阶层子女来说作用更大;而关于英语四级成绩(模型 5-2),文化资本对于一般非体力阶层与管理阶层子女的作用更显著。总体来看,上述结果与假设 3 相一致,也即支持文化再生产理论的预测,精英阶层子女能够从文化资本中获益更多,这是因为文化资本作用在一定条件的支持下会更为突出,而这些条件存在于精英阶层的家庭之中。

表 5 文化资本作用的阶层差异

	模型 5-1	模型 5-2
	B/S. E.	B/S. E.
性别(男=1)	-.111 + (.063)	-21.166 *** (2.203)
民族(汉=1)	.061 (.093)	20.784 *** (3.155)
户籍(非农户口=1)	.019 (.083)	.517 (2.801)
学校(参照项:精英大学)		
211 大学	-.457 *** (.109)	-48.211 *** (3.762)
非 211 大学	-.539 *** (.109)	-86.949 *** (3.753)

续表 5

	模型 5 - 1	模型 5 - 2
	B/S. E.	B/S. E.
专业(参照项: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 214 * (. 107)	15. 661 *** (3. 638)
自然科学	. 266 * (. 104)	10. 668 ** (3. 520)
年级(2008 级 = 1)	. 350 *** (. 059)	8. 139 *** (2. 011)
家庭阶层(参照项:工农阶层)		
一般非体力阶层	-. 135 (. 144)	-. 044 (4. 947)
专业技术阶层	-. 214 (. 373)	14. 179 (12. 569)
管理者阶层	-. 069 (. 223)	-3. 579 (7. 590)
家庭经济资本	. 054 (. 033)	3. 214 ** (1. 139)
家庭文化资本	-. 020 (. 035)	-. 649 (1. 216)
家庭阶层 × 文化资本		
一般非体力阶层 × 文化资本	. 056 (. 044)	3. 307 * (1. 495)
专业技术阶层 × 文化资本	. 100 (. 078)	1. 398 (2. 658)
管理者阶层 × 文化资本	. 112 * (. 051)	3. 569 * (1. 753)
学生活动时间	. 064 *** (. 005)	
逃课		-5. 974 ** (2. 147)
常数项		505. 187 *** (12. 546)
截点 1	. 529 (. 360)	
截点 2	1. 702 *** (. 361)	
截点 3	3. 089 *** (. 364)	

续表 5

	模型 5 - 1	模型 5 - 2
	B/S. E.	B/S. E.
截点 4	4.975 *** (.378)	
N	4004	4004
R ²		.192
-2Log Likelihood	10493.032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六、结论与讨论

总结上文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家庭阶层背景对于大学生在校教育成就的影响比较复杂。精英阶层子女更可能成为级别较高的学生干部,他们的英语四级成绩相对也更高;但家庭阶层地位对大学生学业成绩反而有着消极影响,事实上工农阶层子女的学业成绩是最好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因为工农阶层子女在大学中更加努力,他们将主要精力与时间都投入到了学习和学生活动中去,从而能够突破一些劣势家庭环境的限制;而精英阶层子女在家庭社会经济资本的支持下反而有所懈怠。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客观化的考核和评价体系通过标准化考试来评定学业成绩,文化资本的作用被大大削弱,大学生自身努力成为影响学业成绩的决定性因素。与之相反,像学生干部这种非标准化的选拔,教师具有很大自由裁量权时,文化资本就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即使工农阶层子女更加努力,也难以与精英阶层子女相竞争。

对于文化资本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进一步研究发现精英阶层子女更受益于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更有助于管理者阶层子女获得更高级别学生干部身份和更高的英语成绩。这可能是因为:其一,文化资本在经济资本、信息解码等配合下,能够发挥出更大作用,而精英家庭在各方面都占有优势;其二,学生干部经历和英语成绩对于精英阶层子女的未来发展尤其是出国留学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他们也有意愿来运作文

化资本,获得这些教育成就。

上述研究结果与前文三个研究假设相一致,但与现有的三种文化理论均有不符之处。首先,文化再生产理论假设文化资本有助于教育成就的获得,本文认为文化资本的作用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受限于特定的考核与评价体系。其次,文化抵制理论强调工农阶层子女在学校中反抗教学范式的消极能动性,却忽视了大部分学生积极向上的个人努力。大学生在校教育成就的获得通常是文化资本和个人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学业成绩而言,文化资本作用有限,而个人努力处于主导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就可能实现文化流动,其前提条件是工农阶层子女比精英阶层子女更加努力;而对于学生干部与英语成绩而言,文化资本作用更为突出,因此个人努力仅仅能够削弱而不能完全抑制家庭阶层不平等。最后,与文化流动理论所不同的是,文化资本与其他社会经济资本的作用是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因此在文化资本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容易出现马太效应,工农阶层子女的困境将更加严重。

总的来说,本文强调要将学校行为主体的积极能动性和文化资本作用的复杂性纳入到研究视野中,将原来的“家庭阶层背景—文化资本—教育成就”理论模型扩展成“家庭阶层背景—文化资本/积极能动性—教育成就”,这样才能更完整地理解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形成机制。新扩展的理论模型并不否定教育成就差异的存在,但是也不认为这种不平等是完全由社会结构所决定而不能改变的。

进一步来看,上述研究结果也为本文开始提出的两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微观角度的理解。一方面,正因为工农子弟更努力学习,学业成绩更好,所以他们在国内读研上才不会落后于精英子女。最近的一篇文章也发现,大学为来自于不同阶层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公平开放的学习锻炼环境,他们都能在大学教育过程中提高个人人力资本,而且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可以提高得更多(许多多,2017)。另一方面,我们所看到的工农子弟的努力可能不仅仅表现在大学,而是贯穿了整个教育过程。在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下,标准化考试是升学的决定性渠道,因此工农阶层子女始终可以通过强化自身努力来弥补文化资本的不足,从而突破社会结构壁垒,实现向上流动。正因为此,在社会结构不平等持续扩大的情况下,我国教育机会不平等却维持了相对稳定。

当然,本文所讨论的仅仅是大学生的教育成就,其结果是否适用于中小学还需要将来利用中小学教育追踪调查数据来检验。与大学生相

比,中小学生在至少在两个方面有所不同:其一,相对于大学学业成绩,中小学学业成绩尤其是中考和高考成绩的重要性无疑更为突出,因此精英阶层家庭也会高度重视。其二,与大学生主要寄宿在学校不同,大多数中小學生都是与父母居住在一起,日常受到父母监督指导,因此精英阶层子女可能难以像在大学那样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在课外活动上。这就意味着在中小学阶段,精英阶层子女学业成绩可能不比工农阶层子女更差,甚至会更好(李忠路、邱泽奇,2016)。即使如此,这与本文的推论也不矛盾,在我们看来,工农阶层子女积极努力的意义并不在于逆转教育机会不平等,而是能够抑制这种不平等随着社会结构不平等的扩大而上升。

除此之外,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稳定或许还有其他宏观社会政策与制度的影响,本文只是从不平等形成的微观过程提出一个可能解释,后续研究还可以进一步从宏观层面来讨论其他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参考文献:

- 布尔迪约,P.,2004,《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布尔迪约、帕斯隆,2002a,《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2002b,《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布莱克莱吉、戴维·巴里·亨特,1989,《当代教育社会学流派:对教育的社会学解释》,王波、陈方明、胡萍译,北京:春秋出版社。
- 郝大海,2007,《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1949-2003)》,《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洪岩璧、赵延东,2014,《从资本到惯习:中国城市家庭教育模式的阶层分化》,《社会学研究》第4期。
- 胡安宁,2017,《文化资本研究:中国语境下的再思考》,《社会科学》第1期。
- 卡拉贝尔,杰罗姆,2014,《被选中的》,谢爱磊、周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赖德胜、孟大虎、苏丽锋,2012,《替代还是互补——大学生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联合作用机制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1期。
- 李春玲,2010,《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社会学研究》第3期。
- ,2014,《教育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1940-2010)——对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再考察》,《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李锋亮、侯龙龙、文东茅,2006,《父母教育背景对子女在高校中学习与社会活动的影响》,《社会》第1期。
- 李宏彬、孟岭生、施新政、吴斌珍,2012,《父母的政治资本如何影响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基于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调查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季刊)》第3期。

- 李路路,2014,《中国大学生成长报告(2014)》,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李煜,2006,《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李忠路,2016,《家庭背景、学业表现与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社会》第3期。
- 李忠路、邱泽奇,2016,《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儿童学业成就?——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地位影响差异分析》,《社会学研究》第4期。
- 刘精明,2006,《高等教育扩展与入学机会差异:1978—2003》,《社会》第3期。
- 孙远太,2010,《家庭背景、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上海城镇居民调查》,《青年研究》第2期。
- 唐俊超,2015,《输在起跑线——再议中国的教育不平等(1978—2008)》,《社会学研究》第3期。
- 王瑞贤,2009,《伯恩斯坦:符码与教育论述导论》,张人杰主编《教育社会学:人物与思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威利斯,保罗,2013,《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秘舒、凌旻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 吴晓刚,2009,《1990—2000年中国的经济转型、学校扩招和教育不平等》,《社会》第5期。
- ,2016,《中国当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与社会分层——来自“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初步发现》,《社会》第3期。
- 吴愈晓,2013,《教育分流体制与中国的教育分层(1978—2008)》,《社会学研究》第4期。
- 熊春文、刘慧娟,2014,《制度性自我选择与自我放弃的历程——对农民工子弟学校文化的个案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4期。
- 许多多,2017,《大学如何改变寒门弟子的命运:家庭贫困、非认知能力和初职收入》,《社会》第4期。
- 许家云、刘廷华、李平,2014,《海外留学经历是否提高了个人收入?》,《经济科学》第1期。
- 叶晓阳、丁延庆,2015,《扩张的中国高等教育:教育质量与社会分层》,《社会》第3期。
- 岳昌君、张恺,2014,《高校毕业生求职结果及起薪的影响因素研究》,《教育研究》第11期。
- 张顺、程诚,2009,《西部高校毕业生求职难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比较研究及其交互效应》,《青年研究》第2期。
- 周潇,2011,《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社会》第5期。
- 朱新卓、石俊华、董智慧,2013,《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担任学生会干部的影响》,《高等教育研究》第4期。
- Aschaffenburg, Karen & Ineke Maas 1997,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Careers: The Dynamic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4).
- Blaskó, Zsuzsa 2003, “Cultural Reproduction or Cultural Mobility?” *Review of Sociology* 9(1).
- Boudon, Raymond 1974, “Education, Opportunity, and Social Inequality.” In *Changing Prospects in Western Society*. New York: Wiley.
- Bourdieu, Pierre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 Breen, Richard & Jan O. Jonsson 2005,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Recent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Social Mobi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1.
- Breen, Richard, Ruud Luijckx, Walter Muller & Reinhard Pollak 2009, "Nonpersistent Inequality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Evidence from Eight European Count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4(5).
- Byun, Soo-yong, Evan Schofer & Kyung-keun Kim 2012, "Revisiting the Role of Cultural Capital in East Asian Educational Systems: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5(3).
- De Graaf, Nan Dirk, Paul M. De Graaf & Gerbert Kraaykamp 2000, "Parental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Netherlands: A Refinement of the Cultural Capital Perspectiv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3(2).
- DiMaggio, Paul 1982, "Cultural Capital and School Success: The Impact of Status Culture Participation on the Grades of US High School Stud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2).
- DiMaggio, Paul & John Mohr 1985, "Cultural Capital,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Marital Sele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6).
- Dumais, Susan A. 2002, "Cultural Capital, Gender, and School Success: The Role of Habitu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5(1).
- Farkas, George 2003, "Cognitive Skills and Noncognitive Traits and Behaviors in Stratification Process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9.
- Giroux, Henry A. 1983, "Theories of Reproduct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New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53(3).
- Goldrick-Rab, Sara & Fabian T. Pfeffer 2009, "Beyond Access: Explaining Socioeconomic Differences in College Transfer."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2(2).
- Horn, Daniel 2009, "Age of Selection Counts: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Education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15(4).
- Jæger, Mads Meier 2011, "Does Cultural Capital Really Affect Academic Achievement? New Evidence from Combined Sibling and Panel Data."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4(4).
- Katsillis, John & Richard Rubinson 1990, "Cultural Capital, Student Achievement, and Educational Reproduction: The Case of Gree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2).
- Lamont, Michele & Annette Lareau 1988, "Cultural Capital: Allusions, Gaps and Glissandos in Rece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Sociological Theory* 6(2).
- Lareau, Annette 2015, "Cultural Knowledge and Social Inequal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0(1).
- Lareau, Annette & Elliot B. Weininger 2003, "Cultural Capital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A Critical Assessment." *Theory and Society* 32.
- Lehmann, Wolfgang 2012, "Extra-Credential Experiences and Social Closure: Working-Class Students at University."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38(2).
- Lucas, Samuel R. 2001, "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ducation Transitions, Track Mobility, and Social Background Effect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6).

- Mullen, Ann L., Kimberly A. Goyette & Joseph A. Soares 2000, "Leveling the Playing Field? Student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States' Performance Testing."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3 (3).
- Park, Hyunjoon 2008, "The Varied Educational Effects of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ourteen Countri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52(2).
- Pfeffer, Fabian T. 2008, "Persistent Inequality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its Institutional Context."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5).
- Rafferty, Adrian E. & Michael Hout 1993, "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xpansion, Reform, and Opportunity in Irish Education, 1921 - 75."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6(1).
- Roksa, Josipa & Daniel Potter 2011, "Parenting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al Advantag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4(4).
- Stevenson, David L. & David P. Baker 1991, "State Control of the Curriculum and Classroom Instructi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4(1).
- Stuber, Jenny M. 2009, "Class, Culture,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Collegiate Extra-Curriculum." *Sociological Forum* 24(4).
- Sullivan, Alice 2001,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Sociology* 35(4).
- Van de Werfhorst, Herman G. & Mijs, J. B. Jonathan 2010, "Achievement Inequality and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Educational System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6.
- Xu, Jun & Gillian Hampden-Thompson 2011, "Cultural Reproduction, Cultural Mobility, Cultural Resources, or Trivial Effect?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56(1).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闻翔